

热风学术

热风学术 | 第十辑

REFENGXUESHU

主编 王晓明 蔡翔
本辑执行主编 郭春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热风学术 | 第十辑

REFENGXUESHU

主编 王晓明 蔡翔
本辑执行主编 郭春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风学术.第10辑/王晓明,蔡翔主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829-2

I. ①热… II. ①王… ②蔡…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9925 号

责任编辑 薛 羽

封面装帧 汪 昊

热 风 学 术

(第十辑)

王晓明 蔡 翔 主编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1.5 插页 4 字数 372,000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829-2/G·1801

定价 54.00 元

目录

热风论坛

使文化具有重要性,使文化具有政治性 格罗斯伯格 / 3

“语境化”、“接合”与“交合” 陶东风 / 28

复杂性: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陈建华 / 34

“文化研究”如何应对“普遍性”的挑战? 罗 岗 / 38

文化研究如何“政治”? 倪 伟 / 41

“情感结构”的当代运用 罗小茗 / 46

“形势知识”如何可能? 山 谷 / 50

创造一个另外的世界 雷启立等 / 53

理论·翻译 格罗斯伯格小辑

文化的胜利 格罗斯伯格 / 61

现代性和通约:对当代(经济)危机的一种解读 格罗斯伯格 / 104

文化研究的使命:理解世界与想象别样世界的能力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文化研究向度简介 李 辉 / 142

阅读当下 校园外的文化研究

文化实践守护底层权益与尊严

——木兰社区女工戏剧工作坊回眸 赵志勇 / 159

参与“城市”:来自市民论坛的思考 罗小茗 / 170

文化研究的实践性知识生产 高 明 / 182

文本内外

陈年喜的诗 陈年喜 / 194

编氓野史 刘丽朵 / 210

热风·观察

苏州出租屋纪事 全桂荣 / 226

苏州新工人访谈录 贾孝飞等 / 286

亚洲视域

青年不稳定无产者的移动劳动文化：以首尔为个案 李光锡 / 315

青年的愤怒持续不断：“亚文化：愤怒的青春” 李东渊 / 334

编后记 / 340

热风论坛



编者按

本辑《热风学术》收录两组与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教授相关的文章,一个是他2015年6月在上海大学与同行们的讨论记录:先是他的一篇题为《使文化具有重要性,使文化具有政治性》(Making Culture Matter, Making Culture Political)的长篇引言,接着是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陈建华(上海交通大学)、罗岗(华东师范大学)、倪伟(复旦大学)、罗小茗(上海大学)和山谷(Diego Gullotta,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六位学者的回应文字,最后是开放给听众的讨论记录的节选;另一个是格罗斯伯格教授自选给本刊的两篇长文,以及译者之一的李辉先生的介绍文字。希望这样的编排,能比较清楚地呈现这位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对当今世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站在与他不同的空间和思想位置上的对话者——以及现场提问发言的学生们——对这些问题的多样的意见。

今日世界,正处在问题堆叠如山,有效的解答却普遍不足的窘困之中。无论北美欧洲,还是中东和非洲,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和人们对这些变化的理解的进步,二者之间速度上的不相称,日益扩大;在中国大陆,这些年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中的某些迟钝和肤浅,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和政治——更不用说文化——后果。

在中国大陆,这一状况在知识和学科制度上,有两个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学科分类的陈腐和狭隘,另一个是学院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隔膜与脱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对这些状况的日益增长的自觉,已经在学院生活中激发了若干挣扎和奋斗,所谓“文化研究”的兴起,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总体来看,基本的状况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置身于这样的情形中,我们就特别希望,这两组文章多少能够表明,今日的世界和中国,已经对自许为有意直面现实的思想活动,提出了多大的挑战,也引起了怎样的回应。读者在这里看到的,当然只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展开的无数回应中的某一组,但我以为,其中包含的若干重要的讨论,日后当会引发持续而多样的回响。

使文化具有重要性,使文化具有政治性

格罗斯伯格*

首先我想通过让你们亲眼看到组装语境的方式,来谈谈文化研究事业。因为,我将要表明文化研究就是试图组装诸种语境。

首先,我要表达诸多感激,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教会了做文化研究意味着什么,以及文化研究为何意义重大。我从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1]以及诸多来自英国和全世界的朋友们、同事们、对话者们那里获得了很多帮助,她/他们一直在设法寻找和践行霍尔在他的研究和生活中所力图扮演的角色: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政治知识分子,以不同的身体力行的方式努力把世界变得更好,即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教师、导师、写作者、促成者、体制创设者、牛虻和敢于冒险的人。

一、投身于文化研究

人们可以想想组装(assembling)的练习,即把诸种原件放在诸多关系式中,继而放入更大的关系组合中,就好像你在努力拼装一个巨大的拼图,而你所拥有的只是一个装满很多拼板的盒子,却没有任何人会告诉你这些拼图组装起来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的样图。这是一种实验与想象力的实践,一种力图产生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更好、更为有用的叙述(我希望随着我继续阐发下去,能使得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变得更为清晰)。

所以,就让我来把一些文化研究的拼板组装起来,这一事业是我作为一名

*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传播研究系教授。

[1] James W. Carey 即作者的博士生导师。——译者注

知识分子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都在努力践行和捍卫的事业。我敢肯定,在你们听的时候(假设你们是在听的话),会觉得一些拼图听起来并不那么特别新鲜或者独特,但是我必须恳请你先缓一缓你的判断,直到你能够思考到:当这些图以不同的方式被组装起来的时候,这些拼图如何能相互协同发挥作用;它们是如何相互改变和相互重新定义的;当它们综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们是如何构成“文化研究”的;以及为何人们理解与开展文化研究的方式是一项事关重大的事情。

首先,与其他责任担当相比,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以及那些遭受现存权力关系与结构之苦难的人们负有首要责任。我们需要为意志力的乐观精神寻找理由,这一乐观精神不只是个希望与想象力的问题,而且也是关于政治之诸种可能性上的令人信服和更为开阔的图景问题,这些图景与人们的活生生的现实休戚相关,它们解释人们所处的现实境遇,并且按照她/他们自身对诸种可能性与要求的觉知来促使她/他们行动。

这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有着怎样的乐观主义,我们可能提出何种图景,这些都必须建立在对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缜密理解的基础之上。从而,这就导向了我所认识到的第二点:即在尽可能生产出关于来龙去脉最好的知识这一要求上,知识分子同样肩负着责任;这也就意味着他/她/我们对于我们所面对的“经验事实”负有回答的责任。乐观主义必须是有待去赢回来的,是从知识分子的深刻的悲观中构建出来的,这一悲观是一种源自于知识分子对其所面临的状况——即为反对变革而聚结的诸种力量——的缜密理解中而来的,而不是那种轻而易举得来的悲观精神,也就是那种靠重蹈个人自己的政治的和/或者理论上的定见(certainties)的轮廓而得出的,或者通过重复(可能用更为深奥的语言来包装)常识性的假设、看法和判断而轻而易举获得的,这些假设、看法和判断常常以笼统性的描述和个人的掌故来证明其合理性。正如霍尔那样,文化研究以我们对更美好世界的政治期待所激发的所有激情,一直相信知识与观念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虽然知识不是行动主义,但是它对于构想与运用成功的政治策略与斗争来说,知识是绝对必要的。不了解权力的诸种具体特定现实,不了解生活在这些现实中人们的具体希望与渴求、恐惧与愤怒、能力与想象力,不论是从当下还是长远来看,我们都将继续在斗争上失败。

拼图游戏的第三块拼板就是:现实是由诸种关系构成的。但是坦白来说:很多理论家都以关系性为起点并且包含关系性(relationality)。使文化研究与众不同的因素可能就在于,文化研究是在关系性理论的两个端点之间操作:一端是那

些把关系视为固定的、牢固的和必定的人(“本质主义者”),另一端是那些把关系视为从根本上就不牢固、不固定并且最终表现为不现实的人(“反本质主义者”),他们认为关系始终需要被解构。文化研究把社会现实视为诸种关系持续进行中的生成与转变,或者说是视为文化研究中的很多人所称为的诸种接合(articulations)。此种关系是实实在在的,它们具有实在的效应,但是它们从来就不是永久不变的或者普适性的。它们始终是因情况而异的——世界本来可能还有另外一番景象,并且世界也完全可以另外一番景象。现实是依情况而定的,并且不存在做了保证的最终结果——但是又并非绝对会如此,因为每一种取消或者重造关系的尝试都是在某一有诸多约束性的语境下开展的,即一种由现存的、并且有时候是牢固地确立了的、投入的(invested)、习惯了的或者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诸种关系所组成的语境,一种塑造——巩固或者变革——现实的权力之间的斗争与争夺这一权力所构成的语境。

因此,第四项被组装到文化研究中的应有之义,就是要从语境上来思考,霍尔追随马克思,曾经将它描述为对“历史特定性这一前提的严格运用”。这一点对于定义文化研究具有深刻的影响:文化研究的对象永远是语境,而不是文化本身或者文化的文本和文化的实践所构成的某些分支类别,而是文化如何被接合到以及它如何接合诸种社会历史的语境。而且还不止于此,语境确立文化研究的影响力以及其所声称掌握的真理的坚实基础,从而文化研究一方面要诉诸语境的经验性现实,另一方面要诉诸我们的知识在回应语境的政治要求上的效用。文化研究既拒绝很多不同版本的欧洲现代主义所定义的“真理”(Truth)的普适性,又拒绝很多不同版本的后现代主义所定义的具体真相(truths)的相对主义。文化研究的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意味着,文化研究的发现是“真实的”,但是这一“真实”能成立则只在特定语境内并限于其诸多政治问题的研究上,并且这一发现要求做出非常主动的、强有力的自我反思性(self-reflexivity)的承诺。“彻底的语境性”(Radical contextuality)也意味着,无论是理论还是政治都无法作为个人的反思与考察的起点,因为它们过于轻易地“让你一推了之”。它们会预先告知你答案;它们会提供你诸种担保,从而抹掉始终存在的出人意料的可能性。在文化研究相当简短的历程中,这类理论至少有5次抛弃了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抛弃它,是因为它太把文化当回事;结构主义抛弃它,是因为它太人文主义;后结构主义抛弃它,是因为它相信结构的存在;后现代主义抛弃它,是因为它过分相信物质现实;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理论抛弃它,是因为它又太不信任物质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需要理论就可以搞文化研究——而要

像霍尔那样,他是个没有理论的理论家。文化研究是深刻的理论实践,但又不完全是理论的实践,它没有某种预先定义好的理论。文化研究始终致力于找到最好的、最有用的理论工具,这些工具将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世界的来龙去脉。这通常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沉淀下来的(sedimented)诸种理论立场,从对其掌握的真相如此确信的知识分子那里赢得此类工具(概念和方法)。我们必须与诸种理论展开“搏斗”,轻巧而又有力地尝试去挪用诸多理论上的犀利之处。最后,彻底的语境性必须从语境上定位其自身的研究,也就是说,不要把自身宣称为一种例外(除了一切都是语境性的这一判断之外,一切都是需要语境的),它必须把自身视为对某些当代的情势(conjunctures)的要求或者可以说是时代的要求所作出的临界性(critical)回应。〔1〕

我想放入到拼图中,并且希望你们看到的第五个元件是从我们所有的前述中产生的,这就是我们必须学会以复杂性来思考、行动,甚至是生活。世界(或者其实可以说是任何语境)总是复杂的,甚至要比任何理论或者方法所能揭示的都要复杂得多。语境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具有复杂性的;我们可以说语境的错综复杂性存在于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层面;没有哪一种元件、关系和结构不是早已混杂的、混合的、受多重因素决定的、多重性的和矛盾性的。虽然这在许多当代的关键研究中是太普通不过的口头禅,但是其所带来的结果却通常不受注意:致力于复杂性意味着反对任何形式的还原论(reductionism),因为还原论内在固有的过分简单化问题。对文化研究来说,没有什么永远只与某一件事(或者其实就是单一的二元论)相关。没有什么永远是完全脱离矛盾的。不存在决定点(bottom line)和最终答案,没有什么能够把所有明显的复杂性都包装到一个精致的简易包装中。对文化研究来说,这进一步带来了两种结果:其一,历

〔1〕 按照译者的理解:这里的“critical”应该理解为临界性,来自于物理学中的概念。即某一状态或者说作者所说的情势,是由当时多种因素共同造成。多重因素之间是一种“原因竞争”的关系,单一独立的因素不可能出现该情势。所以,这也就是文化研究的“彻底的语境性”的意义所在,即反对任何确定性和固定性的单一关系分析,而是一种依情况而定的语境性分析。文化研究所揭示的“真理”是条件性的、语境性的,而不是普适性的答案。因而,从事文化研究必须对诸种理论和自身的研究时刻做出自反性;另外,作者毕业于位于美国纽约最为知名的斯蒂文森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是纽约九大大专门高中学校之一。这是一所以培养科学与科学技术人才见长的顶级公立高中,里面聚集了通过极为苛刻考试后挤入的精英学生,培养了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另外,该校的数学和科技教育,是被归属于博雅教育(liberal arts),而不是应用技术与技能的训练。作者在该校获得了极好的科学训练。这一点对作者影响很大,我们可以在他的很多文章中,看到作者对科学史的精到论述或者熟练/习惯性地使用科学术语。——译者注

史没办法按照先后顺序来提前打包好(过去是简单的,现在是复杂的;过去是统一的,现在是碎片化的;过去是理性的,现在是非理性的);其二,在某一特定的抽象层面观察社会现实可能是最为有用的方法,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能既不回避复杂性(就像有些人在划时代的思维方式中体现的),又不会被这些复杂性搞得摸不着头脑(就像我们可能在处理具体事件的时候所体现的)。这一中间的地带便是“情势”,这一地带就是语境只能在其复杂性中才能被理解的地方。

当下,很多理论化并理解当下语境的一流研究似乎相当痛快地抛弃了复杂性,尽管也为此打了几十年嘴炮。我们正在越来越回到一些还原论的形式中——一切都与资本主义或者生命政治(biopolitics)有关,并且常常落入相当简单的“新与旧”二分法的窠臼。比起理解定义情势的多种可能性的各力量之间的平衡,当代批评家们似乎经常更热衷于给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不管什么新东西命名。而更为经常的是,这些新的东西听起来却非常旧——商品化的延伸,把一切都还原到价值的空洞的、可量化的量上,还原到知识、注意力、经验、情感、欲望等领域。此类主张忽视了这些东西是否实际真的新,资本主义在这些努力上有多成功的问题。有时候,新资本主义中的“新”被理解为在马克思把价值等同于劳动时间的地方引入一种新的中介化(mediating)范畴。在此,认为传播、语言与协作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观念变得压倒其他了,这就暗示了某些时候被称为“符号资本主义”(semio-capitalism)的东西的存在,它的存在使得计算和通约价值的新的逻辑成为可能并且被需要。但是此类做法通常忘记了有许多不同的符号系统(semiotic regimes)的存在,并且每一种系统有其自身的复杂性,由此每一种符号系统中,意义、信息、情感、价值等等的诸种维度都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并且,这些做法太过于经常地表现出符号的价值会以莫名其妙的方式规避诸种社会关系所组成的系统的决定性,而这种决定性只能从语境上来理解。我们在操作上必须小心谨慎,并且避免通过简单地把文化对折进(folded in)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将之化约为资本主义。但也并不是将文化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折入资本主义(太多的当代理论家忽略了意识形态的持续相关性,甚至是摒弃了意识形态的可能性),而是被作为一种新的累积模式,即一种新的抽象价值的形式。

我不是在表明资本主义不起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也不是在表明资本主义不是变化性的,而是说,我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是复杂的并且是多重的,资本主义是复杂地被表达的并且是情势性地存在着的,是被特定的关系所定义的,这些关系既把经济嵌入更大的社会形态中,同时又促使经济能够独立于其余的社

会形态之外自主地发挥作用。此外,当代的分析太过于经常地犯下一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定义的错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两种批评,这两种批评都不是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表面现象错认为现实,从而对掩藏在表面之下的真相不加以考察。如果过分简单化,马克思的批判就没有什么用。我更倾向于一种不同的描述,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把部分当成整体,从而提出以更大的生产(市场与交换)回路(circuit)中的某个片段来替代构成整体回路的诸种关系的复杂性。以这种方式,它们所提出的就是拿某种有待(根据其在整体中的位置)解释的东西来解释整体性,它们把复杂关系的效果视为(生成)它们自身经济的诸种可能性条件。马克思的第二个批评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预设,即其“理论上”的范畴被假定为是自然而然的和普适性的,而不是由社会诸种关系所组成的具有历史特定性的诸种系统在语境中的特定表达。也就是说,他们假定了经验性现实与去历史(ahistorical)的抽象存在之间的绝对区分。

我已经兜了个大圈子,现在必须回到第六块拼板,即文化研究,这一学术研究是艰辛的和充满风险的,尤其是在当代研究型大学的背景下,这类大学的结构、运行与价值观似乎与文化研究背道而驰。文化研究要求我们从学科性走向跨学科性的劳动模式,从个体研究模式走向合作研究的劳动模式。同时,这一要求将需要我们去“发明”新的对话形式,这种对话要跨越差异与分歧并在差异与分歧中进行,要求我们“发明”新的交换与分配的形式。这类形式不是与资本主义利润紧密挂钩,要求我们去“发明”新的权威与价值评估的形式。这一形式更为大方、谦虚并具有暂定性(provisional)。虽然我们知道文化研究永远是未完成的、暂时的与开放式的,但是我们必须找到捍卫立场的方式,这样一种方式是以复杂性和应变性(contingency)为名而拒绝接受确定性与终极性(closure)的方式。但是我不想在这里详述这些困难的问题,而仅仅是指出它们将在非常切实的制度斗争与个人风险中牵涉到我们所有人。

二、使文化具有政治性

但是现在,我现在必须向你们展示一些组装者的秘密,因为文化研究不仅仅是组装。就像拼图游戏,它有结构和组织。如果用雷蒙德·威廉斯和迈克尔·福柯都使用的一个术语来说,它就是一种“构型”(formation)。所以,拼图的最后

一块就是：通过组织文化研究的诸多特定构型，来不稳固地（precariously）把所有其他组件合成一体，这一合成始终是在回应驱动这一努力的语境与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一块拼图可能是最为平淡无奇的，在某些方面来说也是最为艰难的：文化并不必然具有重要性，而是在于在某些情势中，文化被创造出重要性，并且有些时候，被创造为政治性的。事实上，如果要解释文化研究在二战以后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传统中兴起的原因^[1]，可以肯定地说，其中一个最为深刻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对日益全球化、资本化以及被大众媒介化（mass mediated）的流行文化的日常性（everydayness）的关注。这很自然，在很多不同地方，一些知识分子使这些问题具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由此就需要去理解文化的复杂性与语境性，尤其是在与权力、霸权、斗争与抗争的关系中去理解。因此，文化研究既与早期有关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如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和葛兰西）关联起来，又与它们区分开来，因为它们往往看不到文化（以及文化与更大的社会总体性之间的诸多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往往看不到文化本身既是冲突性的地带，同时也被当作权力的诸种技术在运行。

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文化研究从来不是直接关于文化的，这是个悖论。我们绝不是简单地研究“文化”，绝不是简单地阐释文本。至少从非常基础的层面来说，文化研究始终涉及话语与非话语的事物之间的接合与组织，这些接合与组织的表现就是文化，他们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形态有着某些关系。我们必须从询问这些问题开始：“文化”是如何被构建的（文化是怎样既被嵌入的又是自主的），以及在其语境中文化是怎样起到了重要作用，或者更清楚点说就是，文化是怎样被创造得具有重要性的。换句话说，文化在其语境中，必将被创造得具有政治性（并且不必在每一种语境中都发生）。在文化被政治化的那些语境中，我们必须看到文化在这一情势下的诸种驱动力与政治斗争中的位置，以及文化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要看到文化的位置被它们所决定并对它们产生影响。

事实上，在任何情势中，都可能存在多样“文化”（cultures），并且甚至存在多重的文化的构造物（constructions），它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文化形态，以结构化的（structured）和可能是冲突性的方式，不仅积极的发挥作用而且之间相互影响。甚至使得文化更为复杂的是，某一特定

[1] 可能有人会认为，文化研究同样也在其他的时候兴起，这些时候以相当突然和铺天盖地地意识到文化的变革为标准，就像 20 世纪早期那样。

的文化形式(modality)本身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势中以不同的方式运行。因此,文化的每一种不同的形态(formation)也可能会在非常不同的方式中是“政治性的”(并且通常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的“政治性”)。

文化以语境化的方式存在,因而我们可以将文化视为是为引导严格的考察,这些考察也是实验,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形绘出某一情势,并将我们通过俯瞰这些图绘而得的对情势的理解接合进去,从而进一步形绘出他们的关系。这些绘图中的每一个又成了另外一个拼图游戏,因此每一块拼板的意义有可能改变你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的理解,并且所增加的每块拼板都能改变其他拼板的意义。所以,拼图游戏始终是处于不断变化和不断地自身重造之中。这里,我想确定三种绘图,我认为它们是把文化研究作为情势分析这一想象的整体的一部分。第一,我们能够建构出可以被称作结构—唯物主义(structural-materialist)的图绘,这种图绘包含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实例或维度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结构和危机。这可能就是我们感到最为舒服的东西,尽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待在我们自己学科对象的舒服的边界中——这就是源自于删除掉诸种关系组成的某一子集(subset)^[1]并且把它客体化为其自身内部的现实和其自身的现实^[2],从而就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常常把每一个实例的相对自治性(autonomy)推向绝对自治的幻觉之中——并且甚至是把我们自己理论上与方法上承诺的诸种方式,推入绝对自治性的幻觉中,甚至是把那些按照我们自身在学科内部所遵循的理论和的原则来建构这一客体的方式推向绝对自治的幻觉中。

我们认为靠简单地把此类学科性知识累加在一起,就能构想出大于部分之和的总体,这是太过常见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总体的作用方式恐怕并非如此,并且不仅是在跨学科的对话方面,而且也在作为这样一种对话的先决条件方面,我们都需要更为严谨地接受跨学科性的挑战。也就是说,每一个学科都必须成为跨学科性形态,从而把跨学科的研究对象重新植入到这一对象所嵌入的诸种关系的错综复杂性中,以便有一个共同现实来作为我们跨学科性对话的基础。如果每个维度都有其自身的实践、逻辑和时间性(temporality),那么也就意味着当这些维度被接合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维度都提供了其他维度的条件和对其他维度的抵制,

[1] 或者范畴。——译者注

[2] 也就是说,不去考虑自身学科对象(限制)边界之外的关系类别,并把这一关系类别客体化为这一范畴自身内部的现实和这一范畴自身的现实,即不会影响到学科对象边界之外的关系。——译者注

每一个维度都部分地建构和解构其他维度。这的确是项相当复杂的工作。比如,不根据统治集团、官僚政治与“人民”之间预先创制的(preconstituted)差异来思考政治,我们可以把政治设想为一系列的治理装置(apparatuses),包括生命政治的(规训、归一化[normalization]、安全化[securitization]、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情感性的[affective])、主体化的(subjectivizing)、组织性的(organizational)、差异化的(differentiating)与暴力,也可以将之视为一系列抵抗、合作与逃避的反组织化的(counter-organizational)。其产生的结果可能是一种结构性关系所构成的混杂构造物,一种更像是由权力、抵抗、创造性和限制性所组成的多重逻辑、实践与结构的维恩图解(Venn diagram) [1]。

第二张绘图就是文化所在的位置,它能够使得我们拐个弯来穿越理论,即在本体论上来思考文化。这将使得我们能够理解正是文化生成活生生的现实(the lived)的领域。如果第一张绘图把德勒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所称为介质(millieu)的东西描述为诸多物质的组装的话,那么这一描述就以某种方式提出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把牛顿式的物理学(由此,康德式的形而上学)与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区分开来,即行为作为一种间隔(distance)是如何可能的。但是这一答案在于德勒兹与加塔利所称为的地域(territory)中,即作为一种由诸多中介化(mediations)所组成的表达性空间,这一答案无论如何都超出了物理学领域。作为表达的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把介质变成了作为活生生现实的空间(the space of the lived)的文化。这无需把现实还原为诸多启蒙的原则,即把经验作为一种指称(signification)与主体性(subjectivity),而是打开了活生生现实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因此也就挑战了人类相对于其他诸种生命形式的狂妄与恋物癖[fetishism])。但是这也意味着作为活生生的物质性(lived materiality)的身体——包括其认知与感知能力——总是文化性的。我们无法把活生生的身体还原为介质的物质性。

文化是活生生现实(the lived)的产物,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无论是活生生的现实还是文化自身都必须用多样性来加以考察。用更为普通的话来说,第二张绘图是经验性的(experiential)以及由文化在特定语境中的运行所驱动,它同时也拒绝把这一文化还原为主体的(subjective)和个体的;这一图绘就图解了我们

[1] 英国逻辑学家维恩制定的一种类逻辑图解,即利用图形的交合来表示多个集合之间的逻辑关系。——译者注

于第一张绘图中所描述的现实的诸种组织共生共存的方式、生活于其中以及违背这些组织的方式。这张绘图要描述人们怎么过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对世界的常识性理解,判断和筹谋所依据的逻辑,通过这一判断和筹谋他们来正视(confront)提供给他们多种选择,以及正视诸种情感的可能性与局限性所组成的诸种组织(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要紧性关联图[mattering maps]等^[1]),正是这些组织塑造他们生活的动力学(energetics)、内聚性(cohesiveness)与脉络肌理。

在后面两张绘图之间的某个地方,我认为可能存在另外一张图,这张图图绘出活生生的危机与斗争的分布状况,正是这些危机与斗争塑造人民生活中感受到的由政治变迁所引起的挑战:虽然,知识分子通常根据第一张图来思考这些(危机和斗争),在特定的(学科)领域之中定位斗争,可能寻找跨越诸个(学科)领域的诸种关系,但是我把活生生的危机想象为蜘蛛网状式的分布,或者表达得更好一点,也就是构成诸多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蜘蛛网状式的分布,这些不稳定性与非确定性把某一情势的活生生的现实^[2]构建成为一个“问题空间”。但是这又是另外一种实验,这里就不做讨论了,因为我们可能很容易被引诱到超过我们知识和能力的地方上去。

这里我所感兴趣的是第二张绘图,以及文化在文化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这一问题。我们或许能够辨识出“文化”出现在不同的格局(configurations)、接合和效果中的不同方式,比如(“文化”出现)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中(的方式),虽然不是把这些方式作为线性的序列,而是作为一系列重叠的问题和斗争的方式来辨识:作为提供其他诸种知识的形式文化(这些知识形式不同于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后者认为科学是唯一有效的[valid]知识形式和模式);作为用以表达个体表现(expressive)和想象的可能,并以某套差别评价方式来组织的物质生产或行为的领域^[3];作为一种与传播和/或者社群(交流)有关联的创

[1] 我们非常在意他人对我们的想法,并且因此“要紧关联图”会对我们的行为施加一种强有力的影响。原则上,每个人、每种社会环境,以及作为整体的社会都存在一种要紧关联图,因为每个人通常都属于不止一个社会群体——工作场所、家庭、朋友圈这些群体,并且运用到它们上的要紧关联图通常是重叠的。要紧关联图可能是一些人的痛苦的来源,但是考虑到人性的现实,他们无法摆脱。作者认为当我们在建设性的事情上相互竞争的时候,关联图能够使得人类取得最大成就,当我们在浪费的或者有害的事情上较劲的时候,关联图会使得我们成就最大的罪恶。

[2] the lived reality,指的是人所经验的现实,即活生生的现实将现实予以人格化。——译者注

[3] 指的是按照某种秩序化的方式来安排。——译者注